

县域经济发展离不开绿色生态农业和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职业农民,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良性循环发展的必由之路

□ 谷亚华

“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涉及“三农”问题的绿色生态农业、新型职业农民与县域经济发展这三个概念是近年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中频频出现的关键词。那么这三个概念之间有何联系?如何促进三者有机统一?本文通过概念界定,探讨三者之间的相关性,并进一步探究三者有机统一的路径。

三个概念的界定

所谓县域经济是指县域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经济,属行政区划经济。“县域经济既包括具有一定城市经济属性的城镇经济,也包括具有乡村经济属性的集镇经济和乡村经济”(戴宾 2018)。各个县区虽然在行政管理方面大致一样,但由于自然地理、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方面的不同,县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发展模式也有所不同。

所谓新型职业农民,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但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新型职业农民,不是传统农民或一般的职业农民,是指居住或者主要生活在农村,具有较强的知识文化素养,掌握一定的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以从事农业的生产、经营或相关服务工作作为自己主要职业,并以此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农业从业人员(黄佩红等 2017)。学者邱立民等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有如下特征:新型职业农民具备较为开阔的视野与观念,是社会化大市场的主体,其生产经营活动是面向市场的,并充分利用市场来获得投资利益的最大化,生产经营过程带有较强的商业性;而且,劳动稳定性较高,农村劳动人口将此作为一种长期的职业,甚至是终身职业,并积极为此培养接班人。

绿色生态农业是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复合概念。所谓绿色农业是指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经验,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崔楠等 2010)。而生态农业是指为实现农业生产、农

村经济的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以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为指导,根据社会的需要,在传统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采用生态经济管理的方法,通过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and 农业资源高效利用,进而建立起高产优质、生态循环、生态文明相统一的新型农业综合体系(许鹏2018)。因此,绿色生态农业即是绿色农业与生态农业有机统一形成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模式。绿色生态农业体现了运用先进科技和资源循环利用的特点,因地制宜,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使农业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

县域经济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与新型职业农民的内在联系

从县域经济概念界定中我们看到,以农业经济作为主体的乡村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国家提倡美好乡村建设、健康中国和环境保护的今天,农业经济也不再是传统的农业经济,而是国家提倡的绿色生态农业经济。尤其是在矿产资源不发达、传统工业衰落、环境污染严重的平原、山区和丘陵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托绿色生态农业来促进经济转型;而绿色生态农业的生产和管理主要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经验,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有机统一,因而,绿色生态农业的发展又要依靠有知识、有技术、有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的职业农民以及职业农民的培育。

因而,县域经济要转型发展离不开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化,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未来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模式;而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又离不开具有创业意识和创新思维,懂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以及电子商务的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的主力军;而职业农民要稳定、持续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都依赖于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化和县域经济的良性持续发展。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与新型职业农民是相互依赖的有机统一体。因此,如何通过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素质,促进绿色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缩短城乡差距,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凝结在生产力的各个构成要素: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力中,并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助力器。在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也是最活跃的是劳动力即人的因素。因此,作为绿色生态农业生产主要劳动力的新型职业农民是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虽然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富足,但有知识、有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懂科学管理和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却严重匮乏,因此,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首先要培育大量新型职业农民。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基础上发展生态绿色农业,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和生态良性发展。为此,笔者提出以下策略。

一是县乡各级政府要登记、召集外出打工无门而返乡的农民和中小学辍学或毕业的新生劳动力以及一直留在农村以传统农业为生的农民,大力创办农民职业培训学校,开设农林牧副渔各专业生产技术以

及农林牧副渔产品精加工技术培训班,并通过互联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高农民农业科技生产能力,扩大农民在农村、乡镇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就业人数。通过组织农民,借助互联网和职业培训学校,培育一大批精通电商的农民,让农民通过互联网销售绿色农业产品,增加收入。

二是加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形成绿色农业全产业链,扩大农民就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缩短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各县级政府要关注绿色生态农业发展的优势,政府要通过财政和优惠政策支持鼓励传统企业转型到绿色生态农业的精加工方面,为绿色生态农林牧业生产解决后顾之忧,提高绿色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绿色农林牧产品的多样化。如将核桃加工成核桃粉、核桃露,与枣一起加工成核桃枣粉、核桃枣露、核桃饼;将核桃、杏、桃、梨等林下饲养的土鸡鸭鹅加工成品牌熟食,将梨、桃、杏等鲜水果加工成饮料、果脯、罐头、醋、酒等;在山地和林地饲养猪牛羊,进行冷冻加工等,打造自己的品牌,销售到各地。这不仅能够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而且能够解决大量的从农村迁移到城镇的无业人口,增加新城镇人口的收入,减少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外流,从而减少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促进县域基础教育稳定发展,为县域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使县域经济发展走向良性循环道路。

三是组织和鼓励更多有资本和技术的管理人才、创业人士创办生态农业公司,承包农民无能力管理或不愿管理和废弃的平川、丘陵、林地和山地,发展绿色生态农业,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中草药、名贵树木、花草,扩大种植果林,如核桃、板栗、猕猴桃、葡萄、桃子、柑橘等,嫁接高产、高质量品种。充分利用一切地上资源,在果林下科学养殖土鸡鸭鹅,以及猪牛羊,使动植物在自然和谐中共同生长,相得益彰。鸡鸭鹅,猪牛羊在林地和山地能够呼吸新鲜空气,吃上新鲜草虫,果林又因为得到动物排泄的有机肥和呼出的二氧化碳而更好地生长。这些绿色生态农业公司生产的无公害、无污染的鲜果和鸡鸭鹅蛋、鸡鸭鹅肉、猪牛羊肉,与乡镇加工企业合作,经过精加工后可以销售到各大城市以及全世界,逐步打造自己品牌。这样,绿色生态农业生产公司与城镇和乡镇绿色加工企业以及销售行业分工合作,进行一条龙生产和销售,形成生态农业产业链,促进县域经济良性发展。

(本文为2016年第二批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山西省农村人口因素对县域经济发展制约性及其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山东潍坊市东篱田园综合体开发运营线上操作、线下收获的操作平台,通过收集消费者下单数据,精准分析市场需求,引导线下及时调整农产品数量、品种,提升农产品交易效率,实现“以销定产、以产促销”。图为东篱田园综合体番茄立体生态工厂一角。

张斌 摄

□ 刘一萌

在生态文明上升为我国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生态农业作为资源、环境、效率、效益兼顾的复合性农业生产体系,成为协调我国农村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解决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新时期我国农村生态环境面临挑战

根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我国有5000万亩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全国因草原退化、耕地开垦、建设占用等因素导致草地减少1.6亿亩,具有生态涵养功能的滩涂、沼泽减少10.7%,冰川与积雪减少7.5%;局部地区盐碱地、沙地增加较多,生态承载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每年大概要用相当于1亿吨的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化肥使用效率比国际低50%。

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农村生

活方式转变,农村生活废弃物由原来主要是可分解物质垃圾,变成大量的难降解垃圾。农村传统的家禽家畜散养方式逐渐被小型畜禽养殖场取代,未进行科学处置的畜禽粪便成为农村的重要污染源。

发展生态农业需要系统性思维

生态农业既是一种环境生态保护战略,也是一种农村发展战略。发展生态农业作为一个农业生态经济的复合系统而运行,能够通过农业经济系统、农村社会系统、自然生态系统的综合统一和同步优化,基于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的多个要素,综合运用生

态系统方法来解决农业与农村良性循环发展的三大支柱性问题——环境生态保护、农业生产优化,以及最终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的提升。将生态农业作为一种发展模式进行打造,更要用外在的系统性思维来考量并设计这一模式能够有效运行的环境、条件、要素、机制等。

借助科技与制度创新探索新思路

形成有效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促进生态农业发展。建立以国家投入为基础、地方投入为支撑、积极调动农业生产经营者自发投入、鼓励社会资本力量参与投入的生态农业多元化投入机制。财政应通过生态

补偿等方式,设立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支持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建设等,以此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运用贴息、补助、以奖代补、投资参股的方式,引导、吸引民间资金、社会资金加大对开发生态农业的投入。地方通过整合各类农业专项资金和奖扶机制,集中投入生态农业,最大限度地提升项目资金的规模效益。对从事生态农业开发、生产和营销的企业和个人给予政策优惠和资金扶持,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生态农业建设的财政、税收、信贷、贸易、土地、风险投资等方面政策,以便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据《光明日报》报道,引入新的经济运行与生态治理理念,

打造生态农业发展的新模式。如可实行农业资源有偿使用和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发展生态农业,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根据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等,建立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谁付费制度,通过这一调节手段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农业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完善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农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制度。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 王丽 刘洋 党丽娟 文扬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新目标、做出新部署,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推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保护提供了重要指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内容的新表述有十余项,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于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的高度重视。

生态环保领域新表述

一是全新表述。全新表述主要指随着形势、环境、要求和自身能力的不断变化,近期重点关注或是开始着手解决的任务。包括为解决生态文明领域的深层次矛盾,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性、整体性建设的“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从类别和区域视角,体现综合、系统、协同治理的“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把握大气污染治理趋势和规律,应对大气污染治理新情况新问题的“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随着工业和技术的

新表述展现出的特征

一是思考维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等表述,均直接强调了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资源利用方面,在集成党的十九大及四中全会相关要求的基础上,加入“科学配置”要求,提出了“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新表述,反映党中央推动资源集约利用思路的连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另外,“十三五”期间,约束性指标管理的搭配动词是强化,此次调整为完善,即“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体现了在近年高强度的环保治理实践探索中,对如何更好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的考虑。除此之外,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加强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承受力脆弱地区影响的观测等表述,体现了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视和强化。

二是目标管理的严格性和超前性。“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

从“十四五”规划建议看生态环保领域新表述及特征

快速发展,解决危害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增强生态服务功能,维护生态安全的“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的“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二是修饰词调整。同样的任务,修饰词在表述中发生了重新组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和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修饰词为陆海统筹。“十四五”规划建议在此基础上将修饰词进一步调整,不仅陆海统筹,同时还要考虑地上地下,即为“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党的十九大指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四中全会指出实行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十四五”规划建议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入“科学配置”,即为“推进资源总量管理、科学配置、全面节约、循环利用”。

三是程度变化。同样的任务,执行程度在“十四五”规划建议的表述中发生了变化。《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重污染天气目标提法是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得到总体消除,此次为“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约束性指标管理从“十三五”期间的“强化”变为“完善”,即,“完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管理”。耕地休耕轮作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探索”到当前的“健全”,即,“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到目前的“推进市场化交易”,即,“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碳排放达峰从以往的2030年左右排放达到峰值,调整为目前的“制定二〇三〇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

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等表述,均在原有基础上提出更高要求。2015年,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确定了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的目标。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任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并将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写入2035远景目标,既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地球的自我加压,更体现了中国担当。关于重污染天气目标提法从逐步消除重污染天气到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关于城市黑臭水体,从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得到总体消除到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此次“十四五”规划建议与上述提法相比,要求更为严格、完成时间更为提前。

三是工作任务的渐进性和动态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培育和发展交易市场。经过近年的探索实践,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正加快建设,水权、排污权、用能权交易试点同步开展。“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推进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在原有培育和发展基础上工作更进一步。耕地轮作休耕方面,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探索实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2016年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正式启动,党的十九大提出扩大轮作休耕试点。在此基础上,“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耕地休耕轮作制度,体现了在原有试点基础上着手制度体系完善工作。“重视新污染物治理”“完善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等表述,既体现了认识的深入和能力的提升,更体现了具体措施层面的与时俱进。

(作者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土地区所)